

《中国考古学·秦汉卷》评价

王子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北京 100872)

吕宗力(香港科技大学文学部 香港)

就考古学的分支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而言,有学者主张可以区分为“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前者“承担了究明史前时代人类历史的全部责任”,而后者“则可以与历史学分工合作,相辅相成,共同究明历史时代人类社会的历史”。“历史考古学的研究范围”“限于有了文献记载以后的人类历史”。“历史考古学”“必须与历史学相配合”,“从断定绝对年代的手段来说”,“主要依靠文献记载和年历学的研究”(夏鼐、王仲殊《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16—17页)。对于“究明”秦汉时期的“历史”来说,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合作”,可以说有非常良好的基础,充备的条件,以及光明的前景。对于这个问题,《中国考古学·秦汉卷》有深刻的思考和全面的表述。

《中国考古学·秦汉卷》是《中国考古学》(九卷本)中的一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刘庆柱、白云翔主编,2010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14部分:绪论;第1章,秦代都城、行宫与直道;第2章,秦始皇陵;第3章,秦代官吏与平民墓葬;第4章,秦各项统一措施;第5章,汉代都城;第6章,秦汉地方城邑与长城;第7章,汉代帝陵与王侯大墓;第8章,汉代官吏与平民墓葬;第9章,秦汉时期的农业;第10章,秦汉时期的工商业;第11章,秦汉时期的简牍、帛书和铭刻;第12章,秦汉时期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第13章,秦汉时

期的中外交流及同周边地区的联系。从结构和内容可以看出,撰写者贯彻着一个重要的学术理念,即《绪论》中用文字所明确申明的“充分重视和利用历史文献,自觉地做好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的有机结合”,同时,“从历史考古学的性质、任务及其特点出发,根据考古资料、运用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及相关学科的方法和手段,对秦汉时期的社会历史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古学研究,如城市及城市生活的研究,社会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研究,科学和技术的研究,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研究,埋葬制度和丧葬习俗的研究,社会意识和精神信仰的研究,中外之间和国内各地区之间文化交流的研究,人们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及行为方式的研究等”。工作的目的,论者明确地指出,是使得“秦汉考古”“在秦汉社会历史和秦汉文明的全面揭示和深入研究中作出应有的贡献”(第17页)。全书贯彻这一宗旨,体现出秦汉考古研究与秦汉史研究相结合在学术上的成功。

在《绪论》中“秦汉考古的主要课题及其展望”部分,撰写者提出这样的研究主题:1. 城市与聚落考古;2. 墓葬考古;3. 物质文明的研究;4. 精神文明的研究;5. 政治文明的研究;6. 社会生活的研究。显然,这些研究任务的设定,与秦汉史研究面对的工作,有着鲜明的共同性。事实上,近年秦汉考古事业的进步,确如《中国考古学·秦汉卷》执笔者所指出的,“呈现出大繁荣的局面,并且出现不少新的特点,突出表现在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

的逐步深入和系统等方面”。这些“新的特点”中最醒目的,是对秦汉历史重要问题的密切关注和深刻探索。秦汉考古研究和秦汉史研究的密切结合已经成为一种确定的学术方向。这种学术自觉确认了秦汉考古研究者和秦汉史研究者的友军关系,同时提升了秦汉考古的学术品位。以对秦汉历史的总体判断为例,《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写道,“这一历史时期,随着秦始皇统一六国,东周时期诸侯割据的局面终于结束,一个多民族统一的、以郡县制度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国家出现在世界的东方,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帝国时代。”汉承秦制,“发展了帝国时代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铸就了帝国时代历史的第一个发展高峰,并对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及其深远和及其重要的影响。”(第1页)这样的表述比较到位,而“帝国时代”一语的取用,亦与多数秦汉史研究者的意见一致。

直道是秦始皇时代为加强北边防务,抵御匈奴南犯而开筑的由林光宫向北,直通长城防线上军事重镇九原的交通大道。直道直通南北,规模极其宏大。秦代经营的交通大道多利用战国原有道路,只有直道是在秦统一后规划施工,开拓出可以体现秦帝国行政效率的南北大通道。在中国早期交通建设的历史记录中,秦直道的建设,是首屈一指的重要工程。特别是在陆路交通建设中,其规划、选线、设计和施工,显示出空前的技术水准和管理效率。对于秦直道的走向,学界认识未能完全一致。《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对于秦直道的重视,超过了以往同类著作。撰写者对争议各方的意见均有所介绍,而最终倾向多数考古学者基于文物资料的判断(第72页)。这种尊重一线考古工作收获的态度,是正确的。在这部书定稿之后的考古发掘,

使得这一认识的学术基础更为坚实可靠。

若干秦汉考古研究存在学术争议的问题,《中国考古学·秦汉卷》的处理是比较得当的。例如,我们看到,《绪论》中在论及1966—1978年“秦汉考古的中断与恢复”时,关于“重要的考古发掘”,涉及“广州市区的秦汉造船工场遗址”。“关于现代科学技术在秦汉考古学的应用”,也说到“广州秦汉造船遗址出土木材”使用“科技手段”的“检测”(第7页)。但是在正文中避开争议,不作有关这一重要遗址性质的介绍和说明。“1969年,甘肃武威雷台汉晋墓葬得到清理,出土了著名的铜‘马踏飞燕’等一批重要文物”,所谓“汉晋墓葬”的表述(第5页),也是可以理解的。第8章《汉代官吏与平民墓葬》中“甘青宁地区汉墓”一节仍采用“武威雷台汉墓”的说法,不过,书中随即写道“需要说明的是,此墓的年代……学术界仍有争议。有人主张墓葬年代为西晋时期……”(第513页)。既表达了撰写者的基本判断,又使读者了解学术讨论中的不同意见。这样的处理方式是适宜的。

由于对秦汉考古进行全面论说涉及面广,工作难度非常大,又因集体操作,协调不易,难免千虑一失,《中国考古学·秦汉卷》亦存在微瑕。如“秦直道”一节关于“秦直道的修筑技术”,撰写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乌兰木伦河是秦直道沿途所经最大的一条河流,河床宽达100米,深20米,秦直道在此惟一的通过方式是架桥,当时是用什么方式、什么材料来架桥的?这些问题都有待于今后的考古工作来解答”(第75页)。提出秦直道通过河流的方式这样的问题有重要意义,不过,上文已经写道:“(秦直道)北至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直道大致在黄河南岸昭君坟附近过河,终止于秦九原郡治所在地,即今包头市西南麻池古城”(第70~71

页)。此处所谓“过河”自然是过黄河。事实上,“秦直道沿途所经最大的一条河流”是黄河,而并非“乌兰木伦河”。《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后记”对于全书结构设计提出几个“需要说明”的问题。撰写者写道,“由于本卷的重点和篇幅所限,对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宗教信仰、衣食住行以及制盐业、造船、交通等,除了有关章节有所涉及外,未设立专门的章节进行论述”(第1026页)。其实,仅就“交通”(“造船”也可以列入其中)而言,还是以“设立专门的章节”,较目前这样将“直道”与“秦代都城、行宫”并说的形式更为适宜。秦汉时期有关交通建设和交通管理的考古发现数量已经相当丰富,而直道这样的重要交通道路虽然是秦始皇时代兴建,在西汉早期和中期依然多有应用,也有养护道路设施、提高通行能力和完善信息传递系统的考古遗存。《绪论》在总结1966—1978年“秦汉考古的中断与恢复”时,特别强调了“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三所高校历史系考古专业的设立”的“标志”性意义(第6页)。其实,在1949—1965年“秦汉考古的形成和初步发展”一节似乎也有必要说到对秦汉考古作出重要贡献的俞伟超先生所在的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和陈直先生所在的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设立。

还应当指出,《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关于“秦汉考古的基本任务”,提出应当“在秦汉社会历史和秦汉文明的全面揭示和深入研究中作出应有的贡献”,所提出的研究任务均富有学术意义。在“社会生活的研究”题下,又强调了四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商品

流通的研究”;“其二,中外交流的研究”;“其三,日常生活的研究”;“其四,礼仪活动的研究”。这些问题均体现出创新性和前沿性的特点。不过,对于“秦汉社会历史”的“全面揭示”,似乎不宜忽视秦汉社会等级问题、秦汉社会结构问题、秦汉社会形态问题。这些老问题看似陈旧,但是我们却始终没有能够透彻揭示和明白理解。实际上,《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关于“秦始皇陵”和“秦代官吏与平民墓葬”,关于“汉代帝陵与王侯大墓”和“汉代官吏与平民墓葬”的分别论述,已经体现了说明这些问题的追求。这其实是秦汉史学界和秦汉考古学界共同的任务。《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在总结1979—2000年“秦汉考古的全面发展”时介绍“秦汉考古的综合研究出现了新的局面”,其中写道,李学勤的《东周与秦代文明》“对秦代社会生活及物质文化的主要方面进行系统的论述”(第12页)。应当注意到,李学勤的这部专著,曾经通过文物考古资料的研究,探讨了秦的社会制度问题。其中指出“睡虎地竹简秦律的发现和研究,展示了相当典型的奴隶制关系的景象”,“有的著作认为秦的社会制度比六国先进,我们不能同意这一看法,从秦人相当普遍地保留野蛮的奴隶制关系来看,事实毋宁说是相反”(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6月版,第378页)。所提出的结论,也许还有必要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但是这样的学术思路和考察方式,可能是从事秦汉史学研究和秦汉考古学研究的朋友们应当共同学习的。